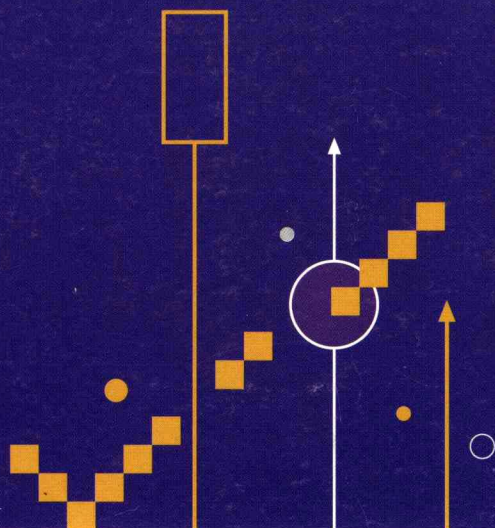


CAMBRIDGE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Susan H. Whiting



政治与社会译丛

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 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美] 白苏珊 著
郎友兴 方小平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因此，地方官员没有什么动力要改变现有的公共物品供应或从集体企业中征税的制度。事实上，为了地方社区目标，他们随时准备操纵这些制度安排。与此同时，乡镇官员既是集体企业事实上的所有者，又是中央国家政权的代理者，要尽收税者和国家银行系统监督者之职责。鉴于他们在集体组织结构中的位置，为了增加乡镇政府的收入，可能会将属于预算内的税收资金（中央政府对此也有权利）转移到“预算外”（这是他们能够有效地控制住的）。与此类似，他们也会操纵银行贷款的分配以利于集体企业。因而，在对集体企业征税和分配信贷方面，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存在制度上的利益冲突。

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 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
(美)白苏珊著;郎友兴,方小平译.—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2009.3

(政治与社会译丛.第2辑)

ISBN 978-7-213-04005-4

I. 乡… II. ①白… ②郎… ③方… III. ①农村—
工业化—研究—中国②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F320.1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7260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8-60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发行

电脑制版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插 页

版 次

书 号

定 价

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美]白苏珊 著

郎友兴 方小平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710×1000毫米 1/16

17.75

28.7万

2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13-04005-4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政治与社会译丛编辑委员会

第二辑主编 郑永年

编委会成员 朱光磊 张小劲 张 静 林尚立
郁建兴 周光辉 周晓虹 郑永年
黄 平 景跃进 刘亚伟

出版者言

出版本辑“政治与社会译丛”是基于我们对出版职责和中国现实的思考。出版者承担着推动知识的引介、传播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之职能，自然地，面对生活，我们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造。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过去经历了什么，她正在面对什么，她将走向哪里，这是每一个关心、热爱中国的人都应思考的。事实上，这不仅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也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而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的目光，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正呈日渐繁荣之势，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涌现了许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潜心研究并撰写出来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我们引进并出版这些著作，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崛起中的中国唯有进一步打开视界，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并在和其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重塑包括学术在内的自身文化的品格。

本辑译丛所选书目是经编委会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的。这些著作研究立场客观，议题重大，视角新颖，体现了众位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中国问题的准确把握，相信读者会从中获益匪浅。当然，由于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定势，局限与偏见难以避免，读者很可能与我们一样对某些观点难以认同；同时，中国社会变化急速而深刻，相关著作中涉及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问题以及作者由此得出的论断，也许已经或正在由改革所解决和修正。以上两点，读者诸君不可不察。

上述文字，算是出版者的不算多余的“多余的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春

译丛第二辑序

译丛第一辑序曾指出,译丛的总体目标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在了解“他者”的过程中,认清和确立自身。那么,更进一步,通过认识他者眼中的“我”来认清自身,是不是一条更便捷的路径呢?在确定译丛第二辑书目之时,编委就这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繁荣。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分子。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现状。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他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欧洲的转型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中国的大转型可说是一个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绝好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畴都可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越出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在研究群体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游学海外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成长得很快,并且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他们在西方接受的社会科学训练和他们的中国经验的对话

结果。这种对话是海外学者本身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传统的汉学基本上把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汉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研究整合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与传统汉学不同，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大都基于社会科学，在研究中国的同时努力把中国研究整合到一般社会科学中去。社会科学和中国研究的整合正把海外的中国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所有这些因素的驱使下，不断有优秀著作和论文问世。

返回到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激增，诸种论争近年来愈渐尖锐，改革似乎到了“行路难，多歧路”的困难阶段。改革之初，我们或许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行进到今天，不对过去的历史和当下所面临的复杂现实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认识，那显然会迷失未来的方向。人的理性固然非常有限，而人类的发展也极少遵照人的理性前进。然而，反思过去，尽可能地理解历史，发现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模式或规律，使社会尽可能地朝着我们加以认同的方向走去，正是社会科学家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此种背景下，引进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无疑是一件急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任何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既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内部发展必然要关切外部世界的境况。西方中国研究往往采取比较的视角，就是把中国置于国际的环境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研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向具有参考价值。就学术进步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真正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各方面也在热议如何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但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说，中国的学术不能自说自话，如果海外不接受中国的话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话语权必须是在和海外的互相交流和互相辩驳中发生和发展的。而引进海外的中国研究作品当是最有效率的一个途径。

我们也相信，本土研究和域外学术是长短互见的。国内学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有着无可匹敌的现场面对研究对象的优势和资料获取上的便利，能切身感受变化的细节和活生生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亲历者的地位也可能导致研究者被自身情感所左右，为利益所羁绊，为其所处时代的“迷雾”所蒙蔽，以至于不能跳出一时一地的障碍，发现问题并理性地把握事物的客观性。反过来，域外学者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容易持比较中立、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

更重要的是,受西方深厚的学术传统的熏陶,他们崇尚科学的认知模式,重视经验、崇尚分析、善于系统化,其分析方式、审视的角度和力度往往是国内学者所缺失的。但同样,由于文化和历史的隔膜,他们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经验和境遇;他们在分析时所持的预设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中国社会。不过从学术进步的视角来说,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源自于不同范式间的交流和冲突。本土学术范式的进步需要海外学术范式,正如海外学术范式的进步也离不开本土范式一样。

所以,我们一方面期待在此译介的著作能开阔国内读者的视界,增加读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希望我们的读者能随时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著作,在审视和追问中超越西方理论框架,真正逼近中国的经验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和提升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建立真正有活力的中国现代学术乃至社会科学。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学术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郑永年

2008年冬

新加坡国立大学

序 言

XV

本书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一方面将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之思推至相关的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那里，以拓展比较政治理论之边界，另一方面从经验和理论上对中国制度的变异性和变迁作出新的理解。

在经验上，本书集中于 1949 年以来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理论上说，本书是想通过三个层面的理论化，建立起一个有关制度变异和变迁动力的研究取向。个体层面的分析为个体行为的假设提供了详尽的、经验的基础；制度层面的分析检讨了地方制度激励和约束个体行为的方式；最后是国家政治经济层面的分析，此分析集中于更大环境中所发生的变迁改变由地方制度所施加的激励和约束的诸种方式。

本研究取向让本书作者能够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解释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前 15 年时间里产权形式所发生的显著的区域性变异，并解释 1990 年代中期以来遍布全中国的引人注目的私有化运动。此外，作者认为，产权的演化与国家税制存在内在关联。在改革的最初 15 年里，乡村企业的产权塑造了地方国家税收制度的演进，而由这些相同的制度所造成的政治冲突是 1994 年进行国家财政改革的一个原动力。1994 年以后的财政改革似乎远离了原来刻板的政策环境，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似乎是对过去的一种戏剧性的抛弃，这些发展可在本研究所展现出来的理论框架中得到充分理解。

比较政治学中静态研究传统近来的不少研究已专门集中于制度分析的层面，因而忽视了制度变迁的许多动力。理性选择传统的研究将个体的动机引入到分析中，但是，有关个体动机的假设常常缺乏足够的经验基础。认知心理学关于人类决策者有限的认知加工能力和不完全信息普遍存在的发现，突出

XVI

了个体决策过程更需要情境化。理性选择传统的研究也已集中于对独特的、“最优”(first-best)的结果的预测。不过,不仅个体不是完全理性的,而且个体和企业存在于环境中的选择压力本身也是不完全的,并不会总产生“最优”的结果。然而,当环境的选择压力变化时,结果也可能变化。因此,为了解释制度的变迁,我们必须考虑来自于个体行动和更大范围环境的变迁的动力。

本研究阐述制度随时间和空间变化而产生的变异和变迁。这是1991年至1999年间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所做的为期21个月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成果。本研究计划是一个对三个地区进行比较的个案研究,它阐述从1950年代到现在40多年来的发展,尤其关注从1978年到1990年代后期这段改革时期的发展。

尽管自1978年以来,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的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本研究的田野调查仍受到了不少挑战。初始的研究设计在选择研究地点时倾向于能反映国有、私营和外资所有制乡村企业产权集中化变异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县和浙江省乐清县的研究地点分别满足国有和私人所有制集中的标准。不过,外资占主导的第三个调查地点——原计划打算在广东省选择——要获得官方批准,这在1991年到1992年做田野调查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选择另一个地点,集体所有制占主导的江苏省无锡县。通过在集体所有制都占主导的两个省选择两个地点,研究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最终有助于我提出和检验一个新的假设,即一个省的调控环境对向乡村工业征税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研究环境不仅清除了路障,而且创造了机会。

第二个挑战涉及研究本身的性质。1990年代早期,在中国尤其在地方政府官员那里,私有财产权还是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其结果是,在对地方官员或企业主和经理访谈时,探讨一个投资者对于财产之要求能否得到满足,对于被访问者来说是一个政治上敏感的话题。同样,关于税收尤其涉及逃税的问题也是敏感的,这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我的访问对象对于这些问题的反应风格迥然不同。被访者是通过官方介绍和非正式的偶遇选定的,但是,反应风格的不同并非基于此。有些被访者在访谈时坦率并乐于提供信息,尽管我们是官方介绍过去的。面对同样的话题,有些被访者固守官方的路线,尽管我们只是偶然遇到他做个采访。

正如这个讨论所暗示的,保护被访者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研究所调研的乡镇和村名已经作了改动,被访者在文本中仅用编号表示。附录中按编号注明了他们的职位、所属机构及访谈日期。

为这个课题,我对企业进行了调查,像所调查的大多数企业财务上欠账一样,我个人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欠下了很多还不清的人情。不少没有留下姓名的人帮助过我的研究,我很高兴能够感谢那些有名有姓的人。中国官方对于我在每个研究地点与地方干部进行协调、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集体访谈以及最大限度地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企业等方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上海社会科学院提供了极好的机构平台。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华盛顿大学校友张仲礼仁慈而热情,他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国民经济所所长谢自奋是一位热情又好客的主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乡镇企业研究所所长凌姚楚*是一位出色的同事和朋友。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研究项目是不可能完成的。凌姚楚的同事们让我有回家般的感觉。认识他们是我的荣幸。而上海社会科学院外办总是随时为我提供帮助。最后,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教师和工作人员,我所得到的最初的机构支持就来自于国政系。

xviii

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副主任 Jean Hung 为我提供了条件,使我在那里的研究富有成果,同时也非常愉快。

此书源于我在密歇根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非常感谢我博士指导委员会的成员,Michel Oksenberg、Kenneth Lieberthal、Robert Dernberger、Yasheng Huang 和 Matthew Evangelista,他们所提出的意见非常宝贵。我也非常荣幸在华盛顿大学校内与校外曾经拥有那些富有激励精神的同事,他们以数不清的方式或大或小地影响了这本书稿。我特别要感谢 David Bachman、Tani Barlow、Yoram Barzel、Loren Brandt、Kiren Chaudhry、Madeleine Yue Dong、Gary Hamilton、Stephen Hanson、Stevan Harrell、Kent Guy、Nicholas Lardy、Margaret Levi、Jamie Mayerfeld、Joel Migdal、Barry Naughton、Victor Nee、Kevin O'Brien、Jean Oi、Albert Park、Elizabeth Perry、Kazimierz Poznanski、Scott Rozelle、Dorothy Solinger、Andrew Walder、Christine Wong 和 Glennys Young。书中有关证据和解释上的任何错误,其责任自然归咎于作者本人。

本书的研究工作部分地得到下列机构的资助: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和蒋经国基金会资助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此外,华盛顿大学的波音学人资助基金(Boeing Faculty Assistance Grant)和中国研究学人研究基金也资助了作者的研究。我感谢这

* 音译。——译者注

些资助的出资者。

xvii 书中的有些内容早些时候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三本著作中：由 Jean C. Oi 和 Andrew G. Walder 主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中国的产权和经济改革》，由 Valerie Braithwaite 和 Margaret Levi 主编、Russell Sage 基金会 1998 年出版的《信任与治理》以及由 John McMillan 和 Barry Naughton 主编、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改革亚洲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增长》。感谢这些出版社同意我在此书中使用这些内容。同时，我也感谢华盛顿大学的崔勇，他帮助我绘制了书中的地图。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 Mary Child 和 Helen Wheeler 仔细而又充满期待地指导着本书的写作过程。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管理员 Nancy Hearst 以其专业素养承担了校对工作。我感谢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所作的贡献。

“非正式”的支持对于本研究也至关重要。我的兄弟，小 Van Whiting，激发出我从事理论研究的志向，而我的父母，Sara 和 Van Whiting，尽其一切支持我的追求。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以表达我对他们的爱和感激之情。

目 录

图表目录	5
序 言	1
第一章 解释制度变迁	1
国家与市场中的制度变迁	4
乡村工业中的制度变异和变迁	16
研究设计	22
本书结构	27
第二章 乡村工业中的毛泽东遗产	30
乡村工业化的历史解释	34
中央政府对乡村工业的政策	36
地方国家权力机构对乡村工业的政策	40
结论：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52
第三章 激励机制与地方干部行为	53
乡镇的财政体制	54
干部考核制度	73
结论：对“作为法团模式的乡镇”的再评估	87

第四章 激励、约束与产权的演化	89
产权的地域模式	90
追求可信的承诺:温州的积累性政策创新与私人	
投资者的选择	112
结论:产权的演化	127
第五章 税收制度的停滞与变迁	130
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性遗产	132
新兴私营企业地方税收制度的演化	134
集体企业对制度变迁的抵制	144
地方规制的框架	156
假设的检验	161
结论:产权、规制环境和税收的动员	165
第六章 信贷分配与集体组织结构	167
金融体系改革:体系结构和政策目标	168
信贷政策在集体部门的实施	174
信贷政策在私营企业部门的实施	192
结论:国家建设与金融改革	196
第七章 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198

1994年以前的地方制度变迁	200
国家层面的改革:中央政策的“本土化”	206
1994年以后的地方制度变迁	215
结论:市场转型的政治	218
附 录	224
参考文献	233
索 引	255
译者后记	264

图表目录

地图

1.1 江苏、上海和浙江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	25
1.2 江苏、上海和浙江所选的研究地点	26

图示

1.1 解释地方层面的制度变迁	19
1.2 研究地点乡镇的行政层级	23
2.1 乡镇(公社)、村(大队)及以下的工业总产值,1949—1978 年	31
2.2 乡镇(公社)、村(大队)及以下的人均工业总产值,1949—1978 年	32
3.1 表明缺乏对效益关注的报纸漫画	82
3.2 表明缺乏对产品销售关注的报纸漫画	83
4.1 温州市乐清县私营股份合作制企业固定资产总额,1986—1994 年	127
4.2 各所有制工业总产值,1994 年	128
7.1 中央在全部预算收入和开支中所占的份额,1978—1997 年	211
7.2 各所有制工业总产值,1997 年	217
7.3 解释地方和国家的制度变迁	219

表格

1.1 解释地方层面的制度变迁	20
1.2 改革中期不同所有制工业产量的区域性差异,1990 年	24
1.3 改革中期经济结构的区域性差异,1990 年	27
2.1 工业总产值,1949—1978 年	33
2.2 人均农业和工业总产值,1949—1978 年	41
3.1 南塘乡财政账目,1990—1991 年	60
3.2 上海市嘉定县南塘乡总收入,1988—1991 年	64
3.3 上海市松江县松阳镇总收入,1989—1995 年	65
3.4 乡镇收入的来源,1991 年	65

3.5	来自于集体和私营企业的乡镇资金	71
3.6	地方党政领导考核标准的全国性指标	75
3.7	上海市嘉定县乡镇长和党委书记的考核标准,1989年	78
3.8	乡镇和村办企业所缴的税收,1978—1979年	84
4.1	乡镇及以下的所有制类型、工业总产值,1978—1997年	95
4.2	工业部门原有固定资产额	97
4.3	温州市华灵镇规模乡镇工业所有制分类明细表,1991年	124
4.4	温州市乐清县乡镇及以下股份合作企业的增长,1985—1994年	125
5.1	温州市华灵镇电器产业中私营企业“同一税率”的样本构成	138
5.2	乡镇和村办集体企业税收,1978—1997年	151
5.3(1)	所有制形式和省级环境对税率的影响	163
5.3(2)	所有制形式和省级环境对税率的影响	164
6.1	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产和负债,1987—1995年	170
6.2	乡镇和村办企业所获得的贷款与农村家庭存款额,1978—1995年	172
6.3	乡镇和村办企业的亏损,1985—1997年	184
6.4	乡镇和村办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1987—1997年	187